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社会学》期末结课论文

(2023-2024 学年第一学期)

《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书笔记

姓名：刘若蒙

学号：20201081109

专业：新闻学

书目信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200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夏合著完成的，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这部著作是以手稿形式流传下来的，并且以俄文于1924年第一次发表。关于这本书未能发表的原因，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描述道：“当1846年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社，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彼时，遭到驱逐的马恩带着各自的书稿计划来到布鲁塞尔汇合，尤其是马克思，他已经与出版商签订了关于经济学著作出版合同（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据郑文吉等学者的考证，客观论战条件的变化迫使二人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来公开阐明其立场，特别是当《维干德季刊》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为费尔巴哈的亚流，早已诀别的鲍威尔的最终完成者，而且将他们看作是对费尔巴哈的继承，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第二级人物，这极大地刺伤了二人智识思想上的自尊。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与论战政敌作正面的交锋，才有可能继续他们目前的研究。这与马克思同出版商的信件一致：

……通过一部反对德国哲学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来表达我自己的决定性的发展，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在一封信中告诉过您的在《政治经济学》出版以前必须完成的论战性著作。

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德意志形态（节选本）》主要收入了其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在开篇的序言中，马恩就使用一个“好汉”比喻来开启与德国哲学家们的论战，以说明其看待观念与世界的关系之不同。

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

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

随即对从施特劳斯道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局限作出了说明，同时，对论战的对象——老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进行了简要的概述。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通过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排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

由此，马恩开启了其论战的第一个方面，也是唯物主义史观的基础，即观念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从前提开始，就与论战的对象不同（“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一基础前提就是现实的个人，是人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包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是可以纯粹用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任何自然基础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在唯物史观中，这一前提是：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

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因此，马恩得以确立其前提：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一前提来自经验的观察，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带有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前提下，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形态》解释道“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德国哲学的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而《形态》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用手稿删除的话来说“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第25页）

《形态》认为，只要能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解放”即是由历史的关系促成的历史活动，而非思想活动。马恩将“历史活动”和“思想活动”并举，正是对德国哲学中对于“客观思想”的崇拜的一种批判。客观思想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作客观思想的历史，而个人（或个人的实践）看成替客观思想的辩证展开的中间环节。这也体现在《形态》对于费尔巴哈使用的“感性确定性”系列概念的批判上。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积劳成疾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

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由此，《形态》展开了确立其系统史观的历史叙述。首先是原初的四个因素，首先，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接着，《形态》就对“非本体性”的因素：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做了详细的说明。

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完全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呢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

在讨论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之后，马恩突然引出了分工问题。而分工问题的

出现，使《形态》前面的一般哲学逻辑阐述，立刻转换成对真实历史的直接批判逻辑。而马克思这一历史的直接批判逻辑，是在对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发展出来的。意识本身在生产基础上的变化，体现了其论述已经引入了真实的历史参数。

“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形态》在此指认道：正是由于分工才造成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因素之间的客观矛盾。首先，分工同时产生了劳动及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这就产生了所有制。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中。第三，分工作为“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必然造成社会活动的物役性，并用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异化”指认这一无法受控的强制力量支配状态。

……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

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在谈论完这一历史进程条件下的共产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对费尔巴哈关于人“存在”与“本质”的批判后，《形态》继续以分工问题为基础展开历史性分析。分工作为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其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同样也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在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或被称为“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道德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这与 Gitlin 在新左派媒介运动的幻象中对国家机器和媒体之间的分析情况一致）。同时，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随着历史进程发展，为自己编造出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

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确实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继讨论过的前三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后（“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随着生产和交往的扩大，《形

态》从以生产力和交往的矛盾作为内驱力出发，重新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这段历史性分析分为三个时期：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的经济发展过程（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起点是行会制度下手工业者形成的“等级资本”）、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加速活动资本的积累，商人阶级的形成），“大工业”发展阶段（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分工的时期）。接着，《形态》对历史进程的评述接近于《共产党宣言》的论证。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且因为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这样做就更容易了。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任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总的来说，《形态》第一卷的第一章涵盖了两个主要部分，即唯物史观的确立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阐述。笔者的读书笔记更偏重于对前者的总结。《形态》中的一系列论述和概念（比如“个人”、“意识形态”、“分工”）也构成了后来思想家对话的对象，从阿尔都塞主体的贫困到卢卡奇的虚假意识，甚至到精神分析流派的拉康的论述中，都能找到与马恩论说对话的线索。但是，正如张一兵指出的，

《形态》中所讨论的广义唯物历史主义是一部抽象的社会历史本质逻辑，一定程度上，是“无现象”的，即不是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指认的东西。简单用常识去对广义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进行指认可能发生误读，同时也还不等于马克思在后来建立起的将本质与现象结合起来的历史现象学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

主要参考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郑文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 MEGA 文献研究. 赵莉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张一兵. 从分工到现实的世界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种经济学的现实批判话语. 《江苏社会科学》，1988 年第 6 期.